

中西文字构源对立对中西语文对立现象的因缘构建

一 中西语文发生学之文字构源阐释

胡益军

(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59)

摘要: 中西语文对比研究中处处发现互相对立的语文现象。语言先于文字而存在, 文字介入意义交际而使交际系统成为三元互动系统。文字构源影响整个语言文字三元系统发展潜能和方向。立足解释中西语文现象的对立性, 本文分析了据意和据音两种基本的文字构源方式, 探讨了中西文字构源即据意与据音的对立性, 提出中西语文三元系统运动的互逆性概念, 并进一步探索中西文字构源和语文系统运动的对立对中西语文诸多对立现象的构建, 从而认识文字构源对语言文字语形、语音、达意、语法等整体特征的因缘构建作用, 以最终实现语文发生学的文字构源阐释。

关键词: 据意构字 据音构词 构源对立 中西语文对立

中图分类号:

正文

世界文字从字源构造方式分为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两大类型。汉语属于表意文字; 西方印欧语语言属于表音文字。人类思维哲学二分始终以中西对立对比而得到体现和彰显。文字构源方式的不同影响整个文字体系的发展方向, 文字构源方式的演变也随之改变整个语文体系的综合特征。中西文字构源的对立因缘中西语言文字的对立。现代汉语是数千年来象形文字基础上不断探索、改革、简化的产物; 英语则源于借鉴于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发展后期中的表音符的闪米特等人创造的表音文字。长期以来中西语言对比研究中处处发现互相对立的语言文字现象, 正是人类文字构源方式的演变和保留的长期结果。

一、文字泛构造方式

在身体与工具相结合的社会化劳动过程中, 为了协作劳动, 劳动者之间共建音义联结¹, 形成具有交际性的语音符号系统(邢福义 2000: 328—331), 而实现即时空交际, 于是人类首先形成语音语言系统。但文字的产生落后于语音已成学界共识。随着语音语言的积累和生产力的提高, 人类交际要求突破语音语言的即时空性。于是人类借用视觉感知媒介, 利用图符(图形或符号)传输意义和信息。不管是语音还是图符, 其目的都是指向意义。交际系统中图符媒介的增加使意义的交际系统成为三元系统。从意义感知一元到语音交际的二元再到增加图符后的三元, 这个“一生二, 二生三”的哲学逻辑过程脉络出语言的生发之路。由于语音意义二元系统的前提存在, 使用视觉媒介图符达介意义, 可有两种潜在的方式: 一是据意构造(见图1), 图符直接与意义或所指直接联系, 再通过意义间接地与业已存在的语音联系而构成一种语言文字三元系统; 二是据音构造(见图2), 图符首先与语音直接联系, 即图符表达语音, 再通过业已存在的语音意义联系, 间接地与意义相联系而构成另一种三元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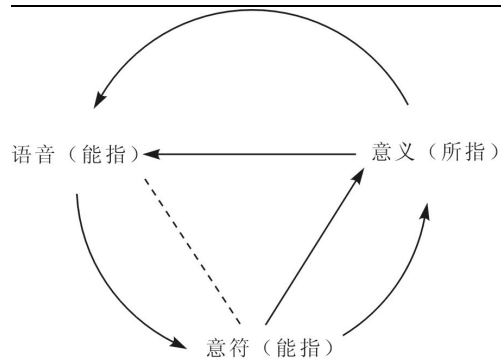


图 1. 表意语文三元系统互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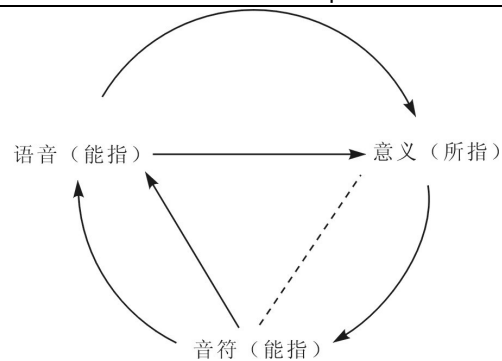


图 2. 表音语文三元系统互动图

图

注：两图中圆表示系统的运动，实直线表示三元间的直接联系，虚直线表示三元间的间接联系，箭头表示联系运动的方向。

世界文字不管采用哪种方式，都会进入业已存在的语音意义二元系统形成三元系统，图符也只有通过这个系统获得与语音的对接才能成为成熟的语言文字（今天的英汉语被普遍认为已较成熟）。据意构造生成意符；据音构造生成音符。随着意符的积累，在特定语境中构建出“三元主客体关系”（辜正坤 2004： 31-35）而表达人类认知关系，从而可实现独立于语言的交际。但是意符与语言的这种距离也会因为交际意义的中介而拉近。据意构造易为人理解，难题是据音如何构造符号文字，即何种符号能象征声音。

二、从世界文字演变历史看据音构造

据意构字方式直接而简单，思维能力还不够发达的人类首先采用，于是世界古老文明文字都起源于象形文字，人类原创诸古文字都利用象形、会意和形声等据意造字方法而“具有共同的造字方法”（吴宇虹：2006：96），属于表意文字体系。据音构造文字表达意义的方式是利用已有语音的一种间接方式，要求造字者有更高的思维水平，文字史已表明表音文字在意音文字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①。据音构造可以通过模拟发声时的发音器官的动作、发音部位的形状、或气流形态抽象出符号而成音符，再按语音达意方式，记录语音符号系统，生成表音文字系统实现交际的跨时空性要求。但是现有研究似乎表明，表音符号并不是按这种方式形成的（此方式的存在有待考证）。由于已经存在的意音文字系统，图符因音的获得而可失去与所指的直接联系而被简化，仍能据音表意，不断简化的意源文字符号远离了三元系统中的所指，使用中深深地附上音的属性，这样表意符号脱胎成表音符号，据音构造顺理成章。人类见机就势地既利用此音符记载意符难以表达或未生成的音义体。记载“语义符不能表示的语言句子中的代词、介词、助词、连词、感叹词等虚词的语音和概念”，记载语义符“不能表示的动词和名词在语言规则变化中必不可少的语音变化”（吴宇虹 2006：92）。把意符用作音符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由于商业往来的语言接触中，音译外来语言。音译词大量出现并落户于它语之中，更脱离音符的原始表意来源，这样音符独立出来，慢慢地具有了表音系统。独立出来的音符与发音动作部位气流的抽象靠拢，于是简化成新的表音符号或文字。由表意图符“发展到变为意音文字，是一种文字体系内部的发展，由意音文字演变为表音文字，则主要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产物”（邢福义 2000：440）。在表意文字前提下产生的音符往往带有形符，而始终为意符模式控制，表音符号必须离开原表意系统才能成为纯表音文字系统，频繁的国际商业和音译则促成了其分离。苏美尔文字发展晚期出现音

符，并以音节符号为主，古埃及文字后期也促成了辅音音符的广泛使用，但最终未能发展为纯粹的表音文字。不断迁徙商业频繁的闪米特人和腓尼基人，时奉意符音符化前提，在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民族的往来中，遂时不待我地创造出西方纯字母文字的渊源。

从表音文字渊源的历史，可以看出音符是意符在三元语言系统中的异化。表音文字需脱离前提的意音文字体系才能得到发展而成系统，根本原因是，在语言三元系统中，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与意义的结合相逆反，从图1和图2的对比中显而易见，一个是通过记录语音间接地记载语义，一个是直接记载语义，间接和直接的互逆从根本上决定了表音与表意文字的不容，而造成交际的歧义和混乱，它们的共同体必将瓦解。意音文字体系下，表音文字的产生往往出于对难以用表意文字表达的语言语法属性、抽象概念、特别是陌生的人名、地名、外来事物等的表达，更进一步地说，在信仰传播、通商和战争背景下的语言接触中，一定程度上，音符是由于记载语音语言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便捷方法。所以频繁的国际交流催生表音文字。历史上频繁交流的西亚地带，需要成熟的表音文字，于是生于各古老意音文字中的表音异质成分相互借鉴、交流和融合，抛弃或改造意符，形成较成熟的表音系统，而成纯表音文字。中国稳定连续的历史，保持了传统与现实的连接，也稳定了意符文字的地位，从而成功的排斥了表音异质的生产，汉语不断完善而成为最悠久的表意文字，与世界表音文字形成鲜明的对照。

三、中西文字构源对立

3.1 据意构造与据音构造的对立

汉语文字构造基础是据意构字。汉语构字有四种主要方式：象形、指事、会意、形声。通过象形构字，一个图形代表一个易于描绘的有形事物，于是奠定了汉语文字的基调。对于难以通过图形描绘的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仍然依据象形的逻辑思维辐射，目标自然承传使用一个图形代表一个意义，借助已形成的象形文字和抽象符号，通过指事、会意和形声方法构造文字表达意义。象形、指事、会意使汉字图形直接与意义联系起来都属于据意构字法。形声借助已有的象形、指事和会意文字把据意构字和据音构字统一起来而形成新的汉字。汉语在发展中进入了外来音译词，这些汉化词语首先使用与其发音相近的已有汉字而成汉语据音构字代表。

如汉语构字那样，图符文字直接联系所指或意义理解性强。西方表音文字据音构造，文字与语音建立直接联系，音符的意符来源往往使音符很难完全摆脱原始表意特征³¹，但是音符的据音构造趋向使其越来越靠近象征发音动作部位或气流的抽象符号，以此通过与语音的直接联系，更多地是间接地与所指或意义联系，从而达到音符记载语言交际意义的目的。汉语构字中的形声法，虽有根据读音造字的成分，但它往往受到形旁的限制始终是据意中音的假借。

3.2 中西语文三元系统运动的逆反性

把图1与图2相对比，很易发现，汉语据意构造与字母文字据音构造方式使文字与意义的结合具有互逆性。这种互逆可描述为：表音文字中文字与语音直接结合，通过语音再与意义间接结合；表意文字中文字与意义直接结合，再通过意义与语音间接结合。三元结合的直接性和间接性的对立使其三元系统成互逆运动而具有互逆性。语言三元系统是一个历时的动态系统，汉语和字母文字构造方式一开始就决定了它们各自系统朝相反的方向互逆运动。这种逆向的系统运动因缘各自语言文字发展中各种语言现象的逆反特征。

四、中西语言文字现象的对立

4.1 言多与文多的对立

汉语据意构建符号文字，据形是基础。因与所指或意义的直接联系，汉语图符文字的优点是辨义容易，即使几千年的甲骨文也能为今人解读。但是，由于所指和语义的纷繁，根据所指和意义建立的文字图形必然量众，一个图形一个意义，随着众多图形汉字的积累，汉字本身的刻书和承传难以进行，进而影响交际，所以汉字体系要求优化完善，汉语文字从甲骨文发展至今不断被抽象简化，验证了汉语据意构字的缺点，即使今天汉字达到数千即使偏旁部首也数目繁多，甚至影响到汉字的电脑输入。当然汉字的不断抽象成符号的结果也以牺牲其易解性为代价。

据音构造文字，不管以何种因素诱发，其图符最终将向象征发音动作、部位形状、气流形态的抽象拟声符号靠近，因嘴形和气流形式本身数量的有限性，用来代表的抽象符号也自然不多；据音构造由于文字与语音的直接联系使文字的语音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字母与语音的直接联系决定了文字发音的稳定性，随着文字的流承传，文字发音不易改变，今天使用英语的民族遍布全球，却还能进行口头交际。据意构造使文字远离了与口头语音的联系，文字语音潜在变化的因素，中国有的方言间就一音难通；但在表意方面，汉语文字“历传承中，超越语言的历史音变，商周秦汉古文现在仍然能读懂”（张岱年 方克立 2004：122），各地方言迥然不同却也能文字统一。语音意义关系的任意性形成汉语众多的方言，各地汉语书面语言却统一稳定；而表音文字通过对音的文字化约束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语音任意性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语音意义任意性特征，由于语音的多变，记录语音的字母文字也易变化，所以印欧语言在地域封闭中，总体发展越来越不规范，最终孳生出多种语言和文字。所以相对而言，印欧文字语音稳定，文字多变，形成多种文字；汉语字形稳定，语音多变，最终在中国形成多种同文字的方言。这就是汉语言多与西方语言文多的对立

4.2 字词的对立

汉语据意构建符号文字，经过无数“仓颉式人物”的文字创造、改革、“整肃”，而简化成孤立的单一方块字（辜正坤 2004：124—125）。不管是语符（语音或语音符号）还是图符达意，最终都须构建出“三大主客关系结构”，而形成自身“三大句法结构”，其符号也类化出“三大词类”，而形成客观世界、语符和字符间的“三元关系同构”律（辜正坤 2004：31-35）。图符在构建三大主客关系中而逐渐系统化，并逐渐与语符系统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异化。发音的生理连续性适应意字的单一结构，遂使孤立图符文字“暗示”、异化语音系统的结构，使汉字语音系统中的“起首元音、起首辅音、复辅音和结尾辅音都相继失落”（辜正坤 2004：125）^{iv}而成一声一韵。同时据意构字下的言文长期分立，也使汉文字体系脱离口头语言而建立适合汉字自身逻辑的声韵语音。一字一意与一声一韵的结合是汉语字的特点。具有此特点的汉语以字构词，再在构建客观三大关系的过程中而形成汉语语言文字。

与据意构造的意符作用相反，音符为记载语音而产生，音符与语音的关系则是适应语音，于是语音中的起首元音、起首辅音、复辅音和结尾辅音得以保留并文字化。同时语法关系义也可通过音符符号化。构建三大主客关系的发音必须符合生理的流畅，形成连读的需要，同时结合语句结构中语义的相对完整性，音符构建的结果是词，且词之音节自由不受文字约束而成开音节、闭音节、单音节、多音节共存。以词构建客观三大关系而成西方拼音语言文

字。

所以，汉语是据意构字，而西方字母文字是据音构词

4.3 开音节与自由音节的对立

与中西语言字词形成的同时，汉语形成单音节、开音节，而西方语言形成开音节、闭音节、单音节、多音节词混合的局面。

汉语据意构字，配字而生声韵单音节，口头语言适应书面语言，起首元音、起首辅音、复辅音和结尾辅音都相继失落，所以汉语生成开音节为主。单音节符号不仅是汉语的特征，也许是所有据意文字体系的特征，“由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字体首先在埃及的形象文字中体现出来，稍后，导致单音节符号的出现”（徐新 2007：26）。印欧语言据音构词，音符不是语音的约束，语言也不用适应音符而改变，据音构造给语言语音留出了自由的发展空间，语音记载完全出于句法结构中语义的区分和表达需要而建立音节，于是开音节、闭音节、单音节、多音节词根据句法结构中相对完整的音义体而自由形成。

4.4 言文相分与言文相向的对立

西方印欧文字据音构词方式，使得其文字一开始就可记录业已存在的口头语言，于是英语书面语言与口语的距离远小于汉语文言文与白话的距离，英语语言也不能形成类似文言文的书面语言。

汉语文字从一开始就通过据意构字直接与意义相联系，其文字只是通过意义才间接地获得发音，远离与口语或语音的联系，汉语图符文字仍然能够独立达意而实现交际的目的。文言文因此而形成并流通，完全能履行记事、表达和交际的语言功能。在中国“中古近代史上，人们说的是古白话，而书面上写的是仿先秦的文言文，言文脱节”成为汉语言文字的典型（张岱年 方克立 2004：118）。据意构字逻辑决定了新增的书面文字语言与口头交际的距离，这种距离直到上个世纪 20 年代提倡白话文，使用文言文的文字记录口头交际的语言，才得到革命性的变化。虽然汉语图形文字能够独立达意，由于存在意义环节联络的与语音（即业已存在的口语）的间接联系，文言文亦受到口语语言的影响，随着白话文的提倡书面语言与口语的互动协调急剧加速，口语中的语法—语义关系属性也不断的文字化而形式化，言文结合也为汉语语法的欧化提供了条件。

4.5 意合与形合的对立

意符（“文字图画”）的特点是所有符号都只能表示与图符相似的具体的动词和名词概念，都是语义符，语义符不能表示语言句子中的代词、介词、助词、连词、感叹词等虚词的语音和概念，也不能表示动词和名词在语言规则变化中必不可少的语音变化”（吴宇虹 2006：92），还不能为人创造性地利用来记载语言中不断类化出的词间、短语间、成分间和句子间语法关系。所以意符限制了语法的形式化，即阻碍语言形合。

据音构词却决定了表音文字书面语言形合的可能。一方面，口头语音先于书面文字，口头交际中表达事物词汇间的语法关系也许比后起的书面语言更早趋成熟，音符记之而成表音文字；另一重要的方面，音符也为人为地类化事物词语和规范记载语法义创造了条件。为了表意的确切性和准确性，表音文字遂创造出繁多的语法字符，从而实现文字的跨时空准确交际。所以据音构字方式使其书面语言发展成具有了词间、短语间、成分间和句子间语法关系的形式化特征，从而发展为形合性的语言。

据意构字使词间、短语间、成分间和句子间语法关系难以形式化，决定了汉语书面语言意合的整体特征的延续。事物词汇间的语法逻辑关系符号化空缺，依靠语言共同体中交际者

的共同语境和感受，在解读时，只有通过“会意”方式，依靠语境，整合语句各个意象，体会唯一的语义。当然对于后世读者解读早世的文言文，由于共同体语境的历时变化，断句等语法解读自然成为理解的障碍。古汉语或文言文对于不学文言文的今人很难解读。

据意还是据音构造文字因成了西方语言和汉语“最明显的差别，就是西方印欧语言有形态变化，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尽量用语法的形式来表达的尽可能的清楚。而汉语则既无形态变化，词类的区分又往往并不泾渭分明，总之有点模糊。”（季羨林 2002: 7—8）。并因此西方语言被称为“语法型语言”，而汉语被称为“语义型语言”（徐通锵 1993: 264）。

4. 6 文简与意精的对立

汉语据意构字局限了语法逻辑在文字中的归类 and 表述，必然依赖语句中字词之间的“藕断丝连”关系，而整体意会，很少形成和使用语法虚词和形式变化。同时，汉语“一音多义，多义字较多，……它一字多用，字义就容易宽泛、笼统。不过它既然笼统的话，它也同时就可以简洁”（辜正坤 2004:185）。文字语音形成变化中也因起首元音、起首辅音、复辅音和结尾辅音等的失落，语法义的无法表音形式化，字音也变得简洁。因此汉语语言文字整体简洁，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极强的综合性。当然这种简洁的结果是牺牲表意的准确为代价的。

当分析汉语据意构字方式下的语文三元系统时，我们很容易发现，汉语的表意简洁是意符与所指或意义直接联系的结果。而西方表音文字通过语音间接地表意，这种间接性自然没有直接方式简洁，并且音符记载逻辑语法义和类化词汇的可能性，使印欧语文充斥前缀、后缀、时态、语态及性、数、格等语法形式。于是西方语言“逻辑性强”、“局部”表意“精确度更高”（辜正坤 2004:186）。

中西语文对立表现在方方面面，本文仅分析了六个方面。总而言之，构字方式的选择奠定了语言文字发展演变的遗传基因。汉语构造基础是据意构字；西文构造基础是据音构词。这种基本的构造方式的对立性形成了各自的文字特点和发展模式。文字和语音在语言文字三元系统中相互适应协调而互动。中西文字构源方式的逆反导致各自语文三元系统运动的逆反性，这种逆反也要求系统诸因素的逆反来协调，而使系统趋向平衡状态。系统诸因素的逆反构成中西语文语音、语形、达意、语法、语篇、文学等诸方面的对立性。

注释：

ⁱ 即时空劳动中，需要协作也为了协作，劳动者利用发音向协作者指示所指，交际意义，从而实现音义结合，产生声音符号。发音选择具有经济性、任意性等特征，但必须具有提示性、区分性等特征并为协作者感知或意识，只有通过协作者间的这种共建，声音符号才能成为具有交际功能的语音符号。

ⁱⁱ² 世界古老的文字都是图形文字包括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所有已知的古老文字体系，都是从表意（句意）的图画文字发展成表词（或词素）的意音文字的”（邢福义 2000: 432—433）。

ⁱⁱⁱ³ 袁立在《字母文字与汉字同构象形论》一文中分析了字母的据形渊源，进一步证实了音符的意符源头。

^{iv4} 语音与意义结合的任意性特征也使语音变化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辜正坤，2004，《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季羨林，2002，汉语文化语用学·序[A]。钱冠连著《汉语文化语用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7—8。

吴宇虹，2006，文字起源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中国文字和字母文字之异同[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90—98。

邢福义，2000，《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徐通锵，1993，语义句法刍议[A]。徐通锵著《徐通锵自选集》[C]。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264。

徐新，2007，《西方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袁立，1999，字母文字与汉字同构象形论[J]，《北京社会科学》（2）：152—158。

张岱年、方克立，2004，《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Defining the Opposi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anguages In Terms of the Opposite Origins of Their Writing

Yijun H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 Cultures,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Abstract: Chinese and Western languages are ideographic and phonetic respectively. A series of opposing language phenomena have been turning out in their comparison. With a purpose of interpreting this point and clarifying the relation of writing origin to language, the paper analyzes two basic types of writing formations---ideographic and phonetic formation---and their oppositeness, explores how they decide the adverseness of mo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anguage's systems with their three elements: writing, phonetic voice, and meaning, and then examines how the different origins causes the opposite language phenomena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alphabetic languages.

Keywords: ideographic origin phonetic origin oppositeness of origins adverse motion of Chinese and the Westerns